

中華文化對啟蒙運動的影響

——以歷史為鏡，觀照當下的文明互鑒

吳志良

文明相遇的起點： 從澳門到歐洲的思想漣漪

十六世紀的澳門，是中華文明與歐洲文明相遇的「第一現場」。葡萄牙商船帶走的不僅是絲綢與瓷器，更是一整套與基督教文明迥異的東方智慧體系。利瑪竇、湯若望等耶穌會士在此學習儒家經典，將《論語》《大學》譯介至歐洲，開啟了一場跨越時空的「文化東學西漸」。正如湯顯祖在澳門目睹「十字門中擁異貨，蓮花座裏堆奇珍」時所感慨的，這座小城實為「中西並舉、古今同在」的文明實驗室。

彼時的歐洲，正深陷宗教戰爭與專制王權的泥淖。耶穌會士筆下「以道德治國」的中國形象，恰似一道理性之光，刺破了中世紀的蒙昧。柏應理主編的《中國哲學家孔子》在巴黎出版後，令西哲讚嘆：「孔子不談奇跡與啟示，只講倫理與秩序，這正是人類需要的哲學！」這種對世俗理性的推崇，直接衝擊了歐洲「君權神授」的合法性根基，為啟蒙思想家提供了批判封建制度的利器。

儒家思想與啟蒙理性的共振

儒家思想對啟蒙理性的影響是深刻的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：

首先是自然神論與道德實踐的融合。萊布尼茨在《中國自然神學論》中指出，儒家「敬天法祖」的本質是一種基於自然法則的理性信仰，與基督教人格化的上帝截然不同。他將「理」與「單子論」相類比，認為二者都試圖以理性解釋宇宙秩序。這種解讀雖帶有誤讀成

分，卻讓歐洲知識界意識到：道德體系無需依賴神權，亦可建立在人性與倫理之上。伏爾泰更將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稱為「人類道德的黃金法則」，以此抨擊教會的排他性。

其次，是文官制度與政治理想的投射。中國的科舉制與官僚體系，成為啟蒙思想家批判歐洲世襲特權的「理想鏡像」。孟德斯鳩在《論法的精神》中分析中國法律「褒獎善行」的治理邏輯，魁奈則從「重農主義」中提煉出「自然秩序」理論，主張效仿中國以農業為立國之本。伏爾泰甚至建議路易十五仿效康熙舉行「藉田禮」，以此重塑君主與民生的聯繫。這些思想實驗雖帶有浪漫化色彩，卻為歐洲現代國家制度建設提供了重要參照。

其三，歷史觀與宗教寬容的啟蒙。衛匡國《中國上古史》記載的夏商周紀年，早於《聖經》大洪水年代，直接動搖了基督教的歷史敘事。伏爾泰在《風俗論》中疾呼，東方民族的歷史比我們悠久得多，憑什麼以歐洲為中心？而中國儒釋道三教並存的宗教生態，更被啟蒙學者視為「無迷信的理性典範」，成為反對宗教迫害的論據。

跨文化對話的現代啟示

今日歐洲，民粹主義興起、價值共識撕裂，與十八世紀啟蒙前夕的困境何其相似！特朗普式的「亂拳」衝擊着多邊秩序，英國脫歐暴露了聯盟的內在裂隙。在此背景下，重溫中華文化對啟蒙運動的影響，絕非懷舊式的自我標榜，而是為破解當下困局提供歷史智慧。

首先，理性與包容需要再平衡。啟蒙運動

過分強調個體理性，卻忽視了文化多元性的價值。中華文化「和而不同」的智慧，恰可彌補這一缺陷。正如澳門四百年來「不同宗教、不同信仰共存共榮，渾然天成」的實踐所示，真正的理性不應是排他的教條，而應如儒家「中庸」之道，在差異中尋求動態平衡。

第二，道德治理與制度創新要相結合。當前歐洲福利制度疲態盡顯，社會治理陷入「技術理性至上」的陷阱。儒家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」的倫理體系，則強調制度設計需與道德培育同步。魁奈曾驚嘆中國「以自然秩序維持千年穩定」，這種將天道與人倫相貫通的治理哲學，或可為現代國家提供超越選舉政治的長期主義視角。

第三，全球史觀下，更需要文明自覺。十九世紀以前，「天朝中心論」妨礙了中外文化交流；十九世紀以來，「西方中心論」遮蔽了文明互鑒的真實歷史，啟蒙運動實為「東西方共同書寫的思想革命」。今日歐洲若欲重振啟蒙精神，當可以澳門為鏡——這個「藏於深閨的文明實驗室」證明：真正的進步絕非文明衝突，而是「各美其美，美美與共」的共生。

在全球化受到嚴峻挑戰、世界秩序和人類價值重構的大時代，我們如何走向新啟蒙的道路？

站在二〇二五年的時空坐標上，我們應該比伏爾泰時代更清晰地看到：文明對話從來不是單向的輸血，也不是被動的接受，而是雙向的啟迪和相互的成就。歐洲需要的不再是十八世紀對中國的浪漫想像，而是深入理解中華文化「知行合一」、「天人合一」的思維特質。



▲澳門大三巴牌坊。

新華社

中國需要的也不是對西方制度的盲目推崇，而是深刻認識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。澳門作為「一國兩制」的成功實踐地，其「中西敘事相結合」的話語體系，恰可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方法論啟示——既要有伏爾泰式的批判鋒芒，也需有利瑪竇式的對話耐心，更需要不同而和的智慧。

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，葡萄牙人進入澳門之時，中國明朝開始對西方有所了解。當歐洲人通過澳門發現中國時，他們也在重新發現自己。今天，當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，我們或許該重讀吳歷在大三巴寫下的詩句：「不住田園不樹桑，琅珂衣錦下雲槽」——文明的真諦，從來不在固守藩籬，而在揚帆破浪、互鑒共生。這也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鑒、協力構建人類共同價值的深遠意義所在。

暖暖古村莊



HK人與事
黃秀蓮

小西灣位於港島最東的一隅，天涯海角，而地鐵只通到柴灣，尚未直達此區，於是巴士載運成為交通主動脈。多線路程的巴士匯聚此站，85號來了，這路車從未坐過，但記得可抵我家，拍卡前請教了司機，才安心上車。車子先走平路，繞過杏花邨外圍，然後登坡而上，左拐右轉，到了阿公岩道。山路狹窄，倏陡忽降，起伏不定，更有黛綠樹色，鬱鬱蒼蒼，還未看足，車子已落到谷地了。忽見左邊村屋疏落，門前一根竹竿晾曬着衣物；寮屋及廠房立在小路另側，挺起鐵皮外殼，也許仍在營生。我為之愕然，舊貌依稀，童年看過的平民房屋，原始而真實，寧靜而隱世地立在眼前。

哎，這番風貌，近日在粉嶺流水響的迂迴路上也曾見過，沒想到市區寸金尺土，小石屋和鐵皮廠居然能殘存在城市角落，難道這段山路遭社會遺忘以至沒有開發？這猜想無法成立，只因高級私營的醫療中心就在咫尺巍峨而立，那麼，村落何以依舊一派古樸遺世獨立呢？

我還未回過神來，巴士已下坡往筲箕灣電車路疾馳而去。這一帶算是熟悉的，在柴

灣道工作了近十年，相看兩不厭是青山，自以為山色早已全收眼底。怎料到山後有山，山環路繞，從柴灣道坡度尚緩的岔路左轉而入的阿公岩道，幾家報業雜誌早就在此設廠，不止墨香飄送文氣瀟藉，竟然還秘藏了理應失落的村莊面貌。

回家後馬上翻查資料，方知道令我驚詫的暖暖古村，原來是阿公岩村。一八四一年開埠之初居民已聚居成村，當時已有村民兩百，後來太平天國餘卒偕家屬逃亡到此，落地生根。筲箕灣既近海又出產花崗岩，居民遂捕魚為業或採石為生，難怪岸邊有避風塘，而山坡頂留下斧鑿採石的立面。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量移民湧入，戶數增至百餘，村民亦陸續轉業。後來一場火災，如今只得二百人居住。看，當年構建因陋就簡，居住與生產比鄰，只求遮風避雨，火爐一樣的鐵皮寮屋亦可安家立業。不過，政府會在今年六月收回這塊地，用來興建可容四千人的公屋。村落連沒叫人惆悵，新型公屋聳立令人欣慰。

這舊時風景城中村落快要消失了。我看山十年不知山，卻剛好碰上那路巴士，無心訪尋偏是驚然相遇，成就了最後的緣分。匆匆一瞥，喜見隱秘的山後，村舍儼然，有花有樹，充滿情趣，旁邊有船廠，還有歷史的回音隱約的足跡，恍惚低訴着兩百年來的滄桑。



流動空間
方元

建築在每部電影中都會出現，但關於建築師的電影卻很少，能在香港上映的就更少。難得的是，今年香港上映了一部關於建築師的電影——《粗獷派建築師》（The Brutalist）。看到香港的幾家大報都發表了影評，我真佩服那些看完部長達三個半小時、令人痛苦和精疲力盡的電影後還能寫影評的人（包括我自己）。

由於職業習慣，我會特別注意建築在電影中的「表演」。在電影中，雖然建築是無聲的，但它的視覺語言很豐富。如果你了解什麼是粗獷派建築，就會理解它在故事中扮演的角色，以及主角與它的愛恨糾葛。

主角托特（László Tóth）是匈牙利的猶太裔建築師，從德國的納粹集中營死裏逃生後，移民到美國。他為賓州的富商范布倫（Van Buren）設計建造了一座社區教堂。那是一座冷峻的、幾何形狀的混凝土結構，除了灰色的牆體，再沒有其他顏色和裝飾。它像一頭粗野獷悍的巨獸，令人敬畏和不安。

顯然，它不是一座讓人精神放鬆的建築。為什麼托特要這樣設計？在影片的最後幾分鐘，托特的侄女索菲亞（Zsófia）為觀眾揭開了謎底：托特的設計構思源自他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。他通過模擬和重構集中營那種幽閉的、令人恐懼的建築空間，試圖重建歷史時空來釋放被囚禁的心靈，以重獲自由。

然而，托特設計的教堂不但沒有把他從過去的痛苦中解脫出來，反而成為范布倫欺壓他的無形牢籠，給他造成新的創傷，推倒了他的「美國夢」大廈。在影片中，這座粗獷派建築由始至終暗示着托特的悲劇命運。

對於一座具有納粹集中營特徵的建築，說它「野蠻」，豈不是比「粗獷」更符合建築形象和劇情嗎？其實，如果把電影的英文名字按

照字面的意思直接翻譯，那正是「野蠻主義者」。

當一個詞有不同的譯名時，就像戴着不同的面具，容易令人迷惑。Brutalism通常譯作「粗野主義」或「野蠻主義」，其他的譯名還有「蠻橫主義」、「野獸主義」等。「粗獷主義」的用法在七、八年前才零星出現。今年，中譯版的《粗獷派建築師》上映後，在傳媒的助推下，「粗獷主義」一詞廣泛地流傳起來。所以，儘管面具不同，但在它們的後面是同一張面孔。

在解釋了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譯名後，還需要提醒電影觀眾注意的是，雖然托特的故事發生在美國，但粗獷主義建築並非源於美國，並非與納粹建築有關，囚禁托特的布漢瓦德集中營也並非粗獷主義風格。

為了避免把虛構的故事與真實的歷史混淆，讓我們離開電影院，走進歷史，看看電影導演沒有講出來的那些故事和事實：

這個建築學派由一對青年建築師夫婦於一九五三年在英國創立，而它的「祖祠」是巴黎的馬賽公寓。那是一座混凝土結構的公共住宅，一九五二年建成。設計者是法籍建築師柯布西耶（Le Corbusier）。在談到這座建築的特色時，他介紹外牆的做法是「béton brut」



▲彩虹邨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公屋的代表作。

作者攝

盪鞦韆的人生



客居人語
姚娟

踏入五月，多倫多的天氣開始和暖。雖然溫差起伏很大，但人們已感受到陽光不再冷峻。馬路上看行人的穿着，厚重雪襖和輕柔花衣共賞，短裙和短褲爭先亮相，有如四季服裝同台展示，也似人們以健康、年齡和適應度在作比拼。

我們也開始「解禁」，到附近的公園散步。公園不大，一邊是一個網球場，另一邊連着一間小學，中間是大片草地。傍晚時分，夕陽仍慷慨灑落在約二米寬的人行小道上。學校已放學，悄無聲色，只有人行道上有人在默默來回走動，偶而向熟悉的「陌生人」微笑點點頭。

這天，剛在人行道邊的長背椅坐下歇息，見一位大媽徑直朝向我們走來。她胸前袋着嬰兒，笑咪咪和我們打招呼。原來是住在同一小街的同胞，相隔幾十間房子，以前

碰過幾次面，互道「早晨」，卻未曾敘聊。我們馬上讓座。內子問她，怎麼不推嬰兒車？她回說，這樣才溫暖，小傢伙很精靈，喜歡在懷裏睡。說完低頭瞥了一下甜睡的嬰孩，眼神裏流露着慈愛和自豪。話匣子一打開，她的話像流水般淙淙不停。

她告訴我們，來自廣州，與先生為幫帶孫子而到加拿大。兩人都已退休，有退休金，住在自己買的樓，生活無憂。早上去公園跳廣場舞，然後幾個好友一起去飲茶，再逛商場，又去市場買新鮮蔬菜、水果和魚肉，雖非大富大貴，日子卻十分輕鬆愜意。

她話峰一轉道：「來到這裏，好像一百八十度大轉彎，跳舞不說，大白天街上靜悄悄的，有時連個人影也沒有，只有車來車往。冬天冰天雪地，被困室內，好像被綁了

手腳。與國內朋友通微信，看着她們唱歌跳舞、飲茶聚會，心裏真不是滋味。」

也許悶得太久了，她有點像他鄉遇故人般傾訴。這時，小孫子在她懷抱裏蹬腳，她忙用手掌輕撫幾下，動情又無奈地說：「都是為這個小寶貝。唉，天下人，哪個不愛自己的子孫？」

沉默一會，她又接下去：「我們辦的是十年探親簽證，等孫子三四歲上幼兒園，我們就回去，然後每一兩年再來探望一次。」內子打趣問：「屆時你要走時兒媳婦又生小孩，怎麼辦？」她毫不猶豫答道：「只好再熬多三四年。」大家都笑出聲來。

我凝望着眼前那片拖着長長樹影的綠色草地，咀嚼着她剛才的話。近些年，不少在國內退休人士，移民或探親，來到加拿大。不論團聚或只為照顧孫輩，都同樣面對一個

問題：生活環境大轉變。語言、氣候、習俗和人際關係等等，從熟悉到陌生，從熱鬧到寂寞，從悠閒到忙碌，在喜悅中滲和不適，思緒免不了大起大落。

這種情況，在年輕移民族中更為明顯。帶著妻兒初來異國他鄉，雖心懷大志，想大展拳腳，但往往碰到不少障礙。有的幸運謀到自己專長的工作，但對職場文化格格不入，還有住房、教育、醫療等等問題困擾，心境依然難免忐忑不安。倘沒多久被解僱，需另謀出路，有如從高處跌到谷底。

如果抵埗後一段時間仍找不到合適工作，其苦惱情況可想而知。對於新移民來說，頭五年尤其是最初三年，是心境忽明忽暗，情緒最不穩定的時候。連根拔起尋找新生活，似乎一下子失去腳下堅實的土地。

移民生涯，像盪鞦韆。